

合作社成员深化合作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数据

李晓锦, 刘易勤

(浙江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研究框架和浙江省杭州、台州、嘉兴、绍兴市 184 份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问卷调查数据, 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方面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深化合作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选取组织绩效、对社长的信任、其他成员信任、组织公平、组织制度和私人资本六个方面 23 个指标,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 组织绩效、对社长的信任、组织公平、组织制度和私人资本是影响合作社成员深化合作意愿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农民专业合作社; 成员; 合作意愿;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32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5)03-0026-06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 specialized cooperative members' deep cooperation intention: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Zhejiang Province

LI Xiao-jin, LIU Yi-qin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members' deep cooperation intention is made from three aspects: behavior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184 questionnaires of Hangzhou, Taizhou, Jiaxing and Shaoxing, four c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This paper selects 23 specific indexes from the six aspects which are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trust in cooperatives president, trust in other members, organizational justice,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 and private capital and uses the SEM to verify them. 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the organization performance, trust in cooperatives president, organizational justice,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 and private capital are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cooperatives members' deep cooperation intention.

Key word: farmer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membership; cooperation intention; influencing factor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需要以微观经济组织及市场化的运行机制为依托, 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实现这种依托的一个有效载体。实践证明, 农民专业合

作社不但可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还可以降低农业经营的交易成本, 切实提高农民收入。近年来,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 截至 2014 年 12 月底, 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 128.88 万户, 比上年底增长 31.18%, 出资总额 2.73 万亿元, 增长 44.15%。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迅速发展, 合作社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合作社成员的合作程度普遍不高。很多合作社在开始的时候搞得红红火火, 但不到两三年就无人问津, 成了一个空壳合作社。究其原因, 合作社中普遍存在搭便车问

收稿日期: 2015 - 05 - 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2YJA630064)

作者简介: 李晓锦(1971—), 女, 山西太原人,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供应链管理、企业间关系管理。

题,很多成员不愿进一步加深合作,只希望从合作社的整体利益中分一杯羹。

当下,要进一步促进合作社发展,除了要完善外部的制度环境以及加强优惠政策外,深化合作社成员合作程度是重中之重。成员与合作社的合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能会随着自身条件以及合作社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其合作程度。从总体上看,学术界对农民选择加入合作社前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对已加入合作社的成员深化合作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很少,且缺乏实证分析。例如,张娜等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的行为受到文化水平、认知程度、销售困难和政府支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1]。卢向虎等认为影响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意愿的因素主要包括农产品价格波动程度、户主文化程度、户主年龄、家庭主要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主要农产品销售半径等^[2]。于潇等运用 logistic 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表明,家庭收入、家庭总人口、了解程度、预期加入能否显著增加收入、周围亲朋好友参与人数等因素对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3]。郑适等研究表明,农产品种类、农业生产经营环境和农户对未来生产规模的计划对农户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的意愿有显著影响^[4]。此外,多数研究仅从某个侧面或少数几个方面对成员合作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缺乏构建合作社成员合作意愿研究的理论框架。基于此,笔者拟以计划行为理论作为基础,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深化合作意愿的理论分析模型,并利用浙江省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的抽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深化合作意愿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引导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参考。

二、研究假设与变量选择

1. 研究假设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意向是影响人们行为最主要的因素,而行为意向主要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方面的影响。行为态度是指个体对执行某一行为所持有的积极或消极的主观感受,主要包括工具和情感两种心理成分;主观规范是指个体感知到的来自周边环境对其执行某一行为的压力,它反映的是重要他人或者组织对其个人行为决策的影响;知觉行为控制

是指个体感知执行某一行为容易或困难的程度,涉及完成某一行为所需的能力、资源以及信心等。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的深化合作意愿也是一种有计划的理性选择,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合作社组织绩效、人际信任、组织制度、组织公平、个人资本等。上述因素通过影响成员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进而影响成员的深化合作意愿。

(1)组织绩效。根据计划行为理论,成员的行为态度与组织绩效有关,合作社组织绩效是影响成员合作态度的工具性成分。农民从合作社中所获得的收益越大,就越可能产生积极的行为态度,进而加强其合作意愿。已有研究也普遍认为,组织的经济绩效是影响农民合作意愿的关键因素。Rhodes 的研究指出,净的经济利益对农民加入或者离开合作社有关键的影响作用^[5]。Sexton 认为只有从参与合作社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农民才会参加合作社^[6]。崔宝玉等也指出合作社成员入股及增加股权的意愿主要受到合作社的收益、成本和风险的边际水平和风险偏好影响^[7]。

(2)人际信任。人际信任是影响行为态度的情感性成分。Bonus 指出,合作社的成功建立在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8]。张康之认为信任关系的深化决定合作的强度,弱信任关系支持弱合作,强信任关系支持强合作^[9]。在中国农村地区,人际信任对成员的态度具有很大的影响。笔者将合作社内成员的人际信任主要分为对社长的信任和对其他成员的信任,成员对社长以及其他成员的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成员的合作态度。成员对社长及其他成员越信任,越可能产生积极的合作态度,加深合作意愿就越强烈。

(3)组织制度。计划行为理论认为,组织制度会影响个体的主观规范。制度是组织中促进成员之间行为协调的规则。合作社的制度主要包括组织章程、运作管理、利益分配、监督惩罚等制度规范,这些正式的制度保证了合作社的正常运行。孙亚范等研究发现,合作社制度是否健全是影响成员合作意愿的主要因素^[10]。胡平波认为,合作社的正式制度可以规范农民合作行为,提高农民计划主义行为可证实的概率,还可以明确农民的责任与权利,形成最终的利益分配方式^[11]。合作社的制度越完善,成员自身的利益越能得到保障,就越能促进成员的深化合作意愿。

(4)组织公平。组织公平是组织成员对其他成员的行为、付出、回报与自身对比所产生的主观感知，成员的主观规范会受到组织公平的影响。成员在纵向比较自身的收益外，往往也进行与其他成员的横向比较。收益的合理性以及公平性会对成员的合作意愿产生很大的影响。Fulton 指出，当成员同质性较强、产权明晰和治理结构透明且不处于某一小团体或管理者的控制下时，成员更愿意与合作社交易以及投资^[12]。Lim 的研究表明，当员工在组织中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他们更倾向于做出不合作的行为^[13]。现有对农户合作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涉及合作社的组织公平，但从实际来看，合作社成员在决定是否与合作社展开深化合作时对组织公平程度非常重视。成员对合作社组织公平的主观感知越强，其深化合作意愿就会越强烈。

(5)个人资本。个人资本是指个人的自身能力以及所能利用的资源，合作社成员的个人资本可以体现在种养殖规模、收入等方面。计划行为理论认为，准确的知觉行为控制反映了个人能力、机会以及资源等实际控制条件的状况，进而影响个人的行为意向。因此，个人资本可以通过影响个人的知觉行为控制进一步影响其行为意向。现有文献中，郭红东等指出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行为受到其文化水平、生产的商品化程度等多方面的影响^[14]。刘宇翔也认为家庭收入对提高合作社成员投资的积极性有显著影响^[15]。成员的经营规模越大、农业收入以及家庭总收入越高，对合作行为的控制力就越强，越有可能产生积极的合作意愿及行为。

上述五方面因素构成了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深化合作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架构。其作用机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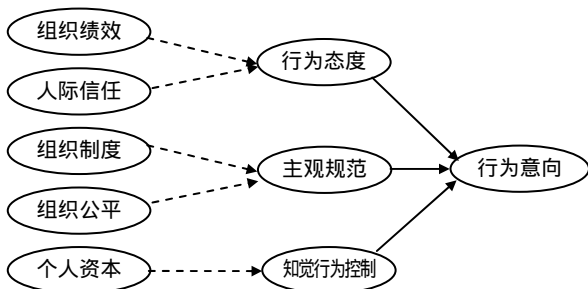


图 1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深化合作意愿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₁：组织绩效对成员深化合作意愿有正影响；

H₂：对社长的信任会正向影响成员深化合作意愿；

H₃：对其他成员信任会正向影响成员深化合作意愿；

H₄：组织制度对成员深化合作意愿有正影响；

H₅：组织公平对成员深化合作意愿有正影响；

H₆：个人资本对成员深化合作意愿有正影响。

2. 变量选择

笔者将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的深化合作意愿设定为因变量，影响成员深化合作意愿的因素设定为自变量。调查问卷的所有问题都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方式，分别给予 1~5 分来反映由弱到强的程度。调查问卷的设计主要参考了 Costigan^[16]、孙亚范^[10]等人的相关量表，同时结合实地调研所了解到的合作社实际情况进行了适当的修改。根据前述假设，成员深化合作意愿的影响因素共分为 5 类，包括 23 个具体指标，而成员深化合作意愿则通过 4 个指标来测量（表 1）。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	观测指标	指标标签
组织绩效	合作社经营状况	
	合作社竞争力	
	成员收入的提高	
	合作社成员福利	
组织制度	合作社制度完善情况	
	盈余分配程序	
	监事会的监督情况	
	财务公开情况	
组织公平	合作社平等对待成员	
	利润分配公平	
	许成员提出意见并采纳	
	成员收入合理	
社长信任	社长使合作社有很大发展	SZXR1
	社长对自己很坦诚	SZXR2
	社长对自己很公平	SZXR3
	社长不会为了个人利益损害集体利益	SZXR4
其他成员信任	其他成员的技术能力很强	SYXR1
	其他成员对自己很诚实	SYXR2
	其他成员会严格遵守合作社的规章制度	SYXR3
	其他成员不会为了个人利益损害集体利益	SYXR4
个人资本	种养殖规模	ZB1
	种养殖收入	ZB2
	家庭总收入	ZB3
深化合作意愿	愿意扩大种养殖规模	HZYY1
	愿意入股或增加股份	HZYY2
	愿意保持稳定交易关系	HZYY3
	未来 3 年内退出所在合作社的可能性	HZYY4

三、样本来源及计量结果分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4 年 8-9 月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的问卷调查。笔者选取建立时间已有 2 年以上的 20 家合作社作为调查对象,分布在杭州、台州、嘉兴、绍兴 4 个地级市,每个地区各选取 5 家合作社,涉及粮食、蔬菜、水果、水产和家禽等当地的主要产业;每个合作社选择 10 名成员作为调查对象,问卷采用集中指导填写,由课题组成员面对面指导完成问卷,一共发放 200 份调查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184 份,有效率达 92%。

笔者主要采用反映内部一致性的指标 Cronbach'a 系数来进行信度分析。通过对各潜在变量的观测变量进行 Cronbach'a 系数检验,个人资本、组织绩效、组织制度、组织公平、社长信任、其他成员信任、合作意愿六个潜在变量的 Cronbach'a 值分别为 0.869、0.930、0.902、0.885、0.936、0.891 和 0.896,均大于可接受值 0.7,说明问卷的信度较好。接着分别对成员深化合作意愿的影响因素和深化合作意愿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特征值 1 作为依据截取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从成员深化合作意愿的影响因素提取出六个因子,且与所要研究的因子相对应,KMO 值为

0.896(>0.7),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概率值为 0.000(<0.01),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9.803%; 成员深化合作意愿提取出一个因子, KMO 值为 0.839 (>0.7),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概率值为 0.000(<0.01),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6.233%。这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为进一步验证各因子划分的科学性,笔者对成员深化合作意愿和影响因素分别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指标如表 2 所示。

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拟合指标

拟合指数	影响因素模型	深化合作意愿模型
χ^2/df	0.823	1.133
GFI	0.870	0.987
AGFI	0.833	0.935
NFI	0.899	0.989
IFI	1.025	0.999
CFI	1.000	0.999
RMSEA	0.000	0.038

从数据的指标来看,两个模型的拟合效果比较好。绝对拟合指数 χ^2/df 分别为 0.823 和 1.133(<2), 拟合优度指数 GFI 分别为 0.870 和 0.987(>0.8), AGFI 分别为 0.833 和 0.935(>0.8), 说明模型整体比较理想; RMSEA 分别为 0.000 和 0.038(<0.08), 说明模型的契合度比较好。因此,可以认为这两个测量模型都具有有效性。

成员深化合作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及成员深化合作意愿模型的路径参数结果如图 2 和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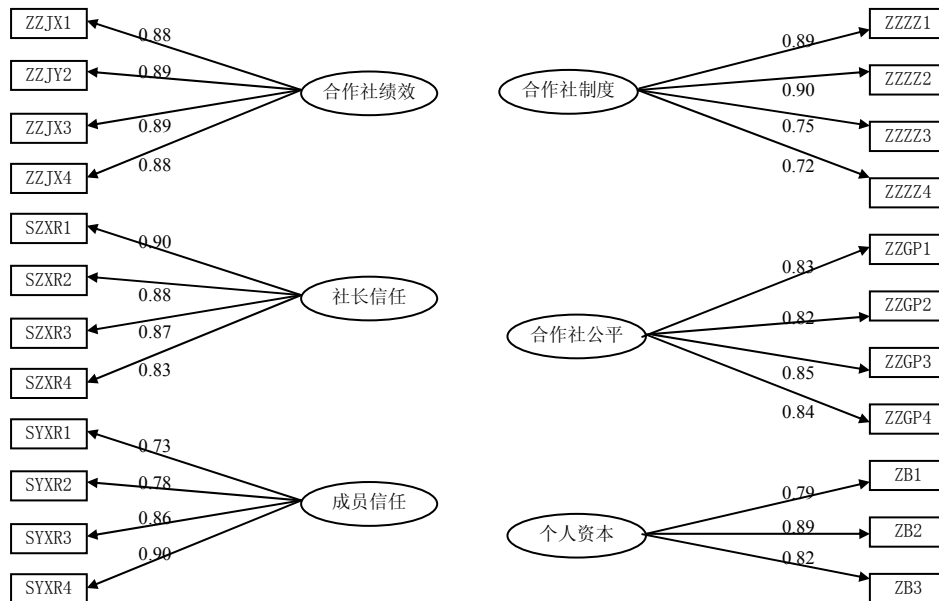


图 2 成员深化合作意愿影响因素模型的标准化路径与参数估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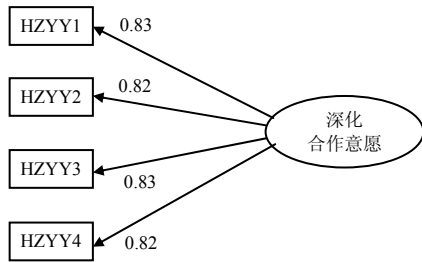


图 3 成员深化合作意愿模型的标准化路径与参数估计

笔者对影响因素与成员深化合作意愿的关系模型进行路径分析。首先分析影响因素与成员深化合作意愿的关系模型的拟合指标(表 3)。

表 3 影响因素与成员深化合作意愿关系模型的拟合指标

	数值		数值
χ^2/df	0.822	IFI	1.029
GFI	0.850	CFI	1.000
AGFI	0.813	RMSEA	0.000
NFI	0.884		

从表 3 可知，影响因素与深化合作意愿关系模型拟合指数的值都比较好，假设模型可以接受。影响因素与深化合作意愿的关系模型路径分析结果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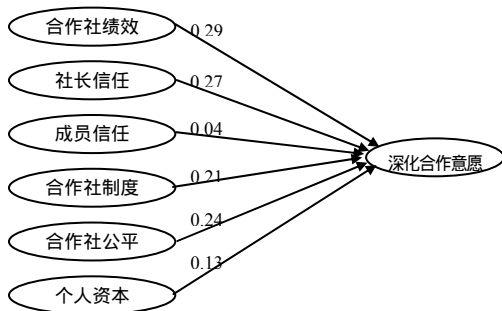


图 4 影响因素与成员深化合作意愿关系模型的标准化路径与参数估计

相关的研究假设检验结果见表 4。从表 4 可以

表 4 模型路径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路径	参数估计值	C.R	原假设
H ₁	组织绩效→深化合作意愿	0.287	2.845***	接受
H ₂	社长信任→深化合作意愿	0.267	2.799***	接受
H ₃	其他成员信任→深化合作意愿	0.040	0.506	拒绝
H ₄	组织制度→深化合作意愿	0.214	2.702***	接受
H ₅	组织公平→深化合作意愿	0.239	2.139**	接受
H ₆	个人资本→深化合作意愿	0.128	1.792*	接受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四、结论及其启示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看出，6 个原假设有 5 个通过了验证。其中合作社绩效对成员深化合作意愿的影响最大，其次分别为对社长的信任、组织公平、组织制度和个人资本。由此看来，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提高收入，合作社的绩效对成员深化合作意愿有重要影响。作为合作社的发起人或组织者，合作社的社长对合作社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农村“熟人文化”的环境中，成员往往对合作社的制度缺乏信心而宁愿相信社长的承诺，因此对社长的信任会影响其合作的态度与意愿。合作社的公平对成员的合作意愿有显著影响。这说明成员不仅关注所获收益的绝对值，而且也会注意自己所获收益的相对值，与其他成员所获收益的对比会影响其深化合作意愿。合作社的制度对成员深化合作意愿也有显著影响，合作社内部的制度规定了不同成员的责、权、利关系以及其他行为规范，通过管理机制、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等影响成员的合作意愿。成员的个人资本对深化成员合作意愿也有显著影响，合作意愿需要建立在自身的实力基础上，个人资本越多，则在合作行为中的控制力也更强，进而越有合作意愿。值得注意的是，实证结果表明其他成员的信任对深化合作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其中可能的原因是目前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成员之间的联系沟通、互帮互助开展得较少，农户加入合作社的获益主要源于合作社经营效益，与其他成员的相互交往所获得的非经济性收益，如技术经验的相互传授等很少，没有形成合作社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因此，对其他成员是否信任不是影响合作社成员加深合作意愿的主要因素。

过程中，成员是否愿意与合作社建立持久、稳定、深入的合作关系，主要受到组织绩效、对社长的信任、组织公平、组织制度和个人资本几方

面因素的影响。根据计划行为理论, 这些因素通过影响合作社成员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而最终影响成员与合作社的深化合作意愿: 组织绩效是影响成员行为态度的工具性因素, 而成员对社长的人际信任是影响成员行为态度的情感性因素; 组织公平和组织制度通过影响成员的主观规范影响其深化合作意愿。此外, 合作社成员个人资本状况决定了其对合作行为控制能力的感知。个人资本越强, 其对合作行为越有信心, 也越愿意开展进一步的合作。据此, 政府要想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持久、广泛和深入的合作, 使合作社真正成为农业产业化的重要组织形式, 应注重以下方面: 首先, 应进一步加强合作社自身的盈利能力, 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与服务, 树立品牌意识, 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经营机制。其次, 要将合作社的整体利益与成员的个人利益统一考虑, 在合作社绩效提高的同时, 适当增加成员的福利, 切实提高成员的实际收入, 增强合作社整体的凝聚力。再次, 通过政策指导、典型示范, 进一步引导合作社完善制度规范, 加深成员对合作社相关制度的了解和认识, 从制度上保障成员的合法权益。此外, 还要在合作社内部形成公平、团结、民主的组织氛围, 组织多种形式的内部交流活动, 不断提高成员对社长及其他成员的理解和信任程度。

参考文献:

- [1] 张娜, 王晶晶. 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0(5): 88-90.
- [2] 卢向虎, 吕新业, 秦富. 农户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社意愿的实证分析——基于 7 省 24 市(县)农户的调研数据[J]. 农业经济问题, 2008(1): 78-82.
- [3] 于潇, 王鹏, 庄园, 等. 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组织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附近南平市的 280 份调查问卷[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5): 33-38.
- [4] 郑适, 王志刚. 农户参与专业经济组织影响因素的分
- 析[J]. 管理世界, 2009(4): 67-74.
- [5] Rhodes V J. The larg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as a competitor[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83, 65(5): 1090-1095.
- [6] Sexton R J. The formation of cooperatives: A game-theoretic approach with implications for cooperative finance, decision making and stability[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86, 68(2): 214-225.
- [7] 崔宝玉, 张忠根, 李晓明. 资本控制型合作社合作演进中的均衡——基于农户合作程度与退出的研究视角[J]. 中国农村经济, 2008(9): 63-71.
- [8] Bonus H. 作为一个企业的合作联合会: 一份交易经济学的研究[M]//埃瑞克 G 菲吕博顿, 鲁道夫 瑞切特. 新制度经济学.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
- [9] 张康之. 论信任、合作以及合作制组织[J]. 人文杂志, 2008(2): 53-58.
- [10] 孙亚范, 余海鹏.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合作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2(6): 48-58.
- [11] 胡平波. 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农民合作行为激励分析——基于正式制度与声誉制度的协同治理关系[J]. 农业经济问题, 2013(10): 73-82.
- [12] Fulton M. Cooperatives and member commitment [J]. The Finnish Journal of Business Economics, 1999, 48(4): 418-437.
- [13] Lim V K G. The IT way of loafing on the job: Cyberloafing, neutralizing and organizational justice[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2, 23(5): 675-694.
- [14] 郭红东, 蒋文华. 影响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的因素分析——基于对浙江省农户的实证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04(5): 10-16.
- [15] 刘宇翔. 农民合作组织成员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10(2): 110-118.
- [16] Costigan. A multi-dimensional study of trust in organizations[J]. Journal of Managerial Issues, 1998, 10(3): 303-317.

责任编辑: 李东辉